

大象

学术

译丛

[英] N. H. 拜尼斯 (N. H. Baynes) 主编

陈志强 郑玮 孙鹏 译

陈志强 校注

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N. H. 拜尼斯 主编

陈志强 郑 玮 孙 鹏 译

陈志强 校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英)拜尼斯(Baynes, N. H.)主编;
陈志强,郑玮,孙鹏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3
(大象学术译丛/陈恒,王秦伟主编)
ISBN 978-7-5347-6587-2

I. ①拜… II. ①拜…②陈…③郑…④孙… III. ①拜占庭学
IV. 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2243 号

大象学术译丛

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

[英]N. H. 拜尼斯 主编

陈志强 郑玮 孙鹏 译

陈志强 校注

出 版 人 王刘纯
特约编辑 王嘉黎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钟 骄
书籍设计 付铨铨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6290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中文版前言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本《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与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些描述拜占庭帝国历史与文化的书籍都不同，其鲜明的特点大概只有读过此书的读者才能对比出来。但是，要求一位普通的读者遍读拜占庭学方面的书籍是不可能的，即便对于那些初入此道的学子来说，这样的要求也有些苛刻。然而，我们这些常年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对此就不陌生了，特别是在多次阅读本书之后，其鲜明的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就此略谈一二，既是与读者交流读书心得的快事，也是以举手之劳方便读者阅读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与一般叙述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书相比，本书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作者们（注意这里是复数）不是简单地讲述拜占庭历史，也不是单纯地描述拜占庭文化，而是经过深刻的思考后，论述拜占庭学上的重要问题。因此，全书各个章节都采取了一种论说式的写作风格，有些部分近乎散文。他们不纠缠于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具体细节，而是将自己长期的甚至是一生研究和思考的结论呈现给读者。因此，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本书没有太多的注释，作者们在论述中涉及的史实都是信手拈来，从而保证了他们通畅连贯地表达各自的真知灼见。这样的历史书并不多见，像基托的那本《希腊人》就属于这样的上乘之作。事实上，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描述容易见识难，能说清一件历史和文化现象固然需要在梳理史料上下大力气，但是能够通过对史实的重新建构达成某种认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这就是为什么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史书中首推第一的重要原因，不单单是因为他们

有开拓之功，也在于他们有史家的真知灼见，“太史公曰”就是画龙点睛之笔。拜占庭学界这样的书太少，描述性的书籍太多，对于喜欢读思考型作品的读者来说，本书无疑提供了重要的读本。笔者就特别推崇那些终生致力于某个领域研究的老学者们晚年所写的散文作品，其中闪烁的智慧之光他们终生研究思考、人生感悟的结晶，如同多年酿制的老酒总是散发着经久不息的醇香，让人回味无穷。这本书的作者们几乎都是拜占庭学界的元老级大师，他们在有限的篇幅中为我们呈现的就是他们一生研究思考的结晶，尽管像《希腊人》一样，初看起来书中的部分章节很少注释这一点给人轻薄的感觉，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原来它的内容非常厚重。

其次，与我们国内读者现在能够找到的拜占庭历史和文化书籍相比，本书采用了专题体例结构，对于这点，读者翻开本书的目录就可以发现。这种专题体例与按照时间编年体例撰写的史书各有各的优点，前者长于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现象的整体性考察。或者说，这种体例便于历史研究主体性表达，即作者们围绕自己专长的问题展开论述，从而使拜占庭帝国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纵向的整体解释。例如拜占庭经济史发展线索，在编年体例的史书中常常给人断断续续的感觉，难以使人形成对拜占庭帝国上千年社会经济生活的总体认识。谁能从大部头多卷本的《中国通史》中得出像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两卷本）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那样的结论呢？就以本书的“前言”为例，主编拜尼斯不是一般地介绍拜占庭学研究状况、史料来源、全书概要等，而是抓住了截至他那个时代关于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争论要点，诸如以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拜占庭历史的开端、拜占庭帝国历史和文化的本质、拜占庭人的历史贡献、这个早已逝去的帝国最主要的特征等，分析有针对性，见解合理客观，所言处处切中要点。而其独到见解是多数拜占庭史书“前言”中所没有的。原来他写的前言也是一个专题，符合全书的安排。这样的前言能给读者很多启发，比起常见的“前言”或“绪论”中那些不着边际或寒暄程序性的言辞要高明得多。这也是笔者不愿意请“名家”为专业书籍写此类文字的原因，因为可以使邀请者和被请者双方都卸下不必要的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正像本书主编在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我作为一个主编

完全无意设法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本书的各位作者”，可能是这些作者本人都是各有主见的，也可能是主编在此强调“言论自由”的原则。但全书的确保持了各个专题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各章提供的注释也详略不一，这也许并不是一个优点），从而使各章论述的观点显得更为完整，给人从容阅读而后掩卷沉思的余地。

再者，本书在有限的篇幅中，向读者展示了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精华，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随着人们对拜占庭文献和文物史料挖掘工作的深入，随着人们对这个上千年帝国的认识的深化，拜占庭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精细，有关内容越来越庞杂。时至今日，任何拜占庭学者都不能说自己样样精通，什么都懂。就以拜占庭帝国历史而言，本书仅用了一个章节就全面论述出来，而且其中的主要线索相当清晰。当然这与本章的作者有关，他是法国拜占庭学鼻祖级的大师夏尔·迪尔（Charles Diehl），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早就被他吃透了，那么一部庞杂沉重的历史在他那里就变成了娓娓道来的故事，成了一曲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的优雅乐章。他是这样结束这个乐章的：“这个垂死帝国放射出的并不是一小抹光彩，而是‘在最后灭亡的时刻聚集了其全部精神能量放射出的一派落日余晖’。”那种悲壮而辉煌的精神气质就成了他为拜占庭帝国历史画上的句号。从容不迫地讲述历史并不意味着肤浅和没有深度，有些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史书实际看不出什么真货，充其量不过是史料的堆砌。问题的关键在于论述要有详有略，重点突出。本书所涉及的问题都是解读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关键问题。例如在谈论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这个最复杂又最有特色的问题时，作者使用的篇幅并不太多，仅 40 页（原文）而已。笔者最初的感觉是，这怎么可能表述清楚。但是细读之后才知道，作者紧紧抓住了“皇帝专制”、“官僚政府”、“军事外交”这三个关键问题，深入探讨了它们长期存在的合理性，清晰解释了它们内部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最终说明了它们何以能够支撑拜占庭帝国这个西方中古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厦长期不倒的原因，也讲清了这个大厦最终坍塌的必然结果。细细想来，这三个问题抓得很准，因为就拜占庭帝国而言，它们就是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和拜占庭帝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所在。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军事技

术发明“希腊火”在这里得到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因为它对拜占庭帝国的生死存亡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挥舞刀枪剑戟便能横行天下的冷兵器时代，它的发明不啻于我们时代的核武器。这类重点问题在本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那些随之提出的问题甚至比作者阐述的结论更有价值。笔者没有对全书提出的问题或作者刻意引发的问题进行过全面的统计，但是，本书提出的问题可能还真的超过了其论述的结论。这对初入拜占庭学门径的读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指南。高级学者提问题，中级研究人员回答问题，低级工作者作注释，这样的分类可能不十分准确，但是确实反映研究工作的高下之分。本书的水平恰好也说明了这一点。

长于思辨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也决定了其论文式的写作风格。这就使翻译的难度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料，也大大增加了翻译的时间。郑玮翻译了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孙鹏翻译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陈志强翻译了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并进行了审校和必要的注释。尽管翻译者和审校者都是多年从事拜占庭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士，但本书中文本还会存在一些翻译上的不足，诚恳请教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今后修改。

本书中文翻译依据 N. H. Baynes and H. L. B. Moss ed.,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陈志强

2011 年 12 月

前 言

“历史中并不存在开端和结尾。历史书是有开端和结尾的,但是历史书籍描述的历史过程并无开端和结尾”。^{〔1〕} 这确实是一个有益的提示,因为最初的那些基督徒已经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按照基督降临而预设的世纪,以及他们的上帝现身人世以后的年代,进而历史学家为了更好地掌握史料,并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发展,又被迫非常危险地努力将历史发展的长河划分为许多阶段。那么,拜占庭帝国是什么呢?它何时开始存在?又是何时结束的?关于其灭亡的年代几乎毫无争议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的1453年。但是,关于一个特色鲜明的拜占庭帝国何时开始存在的问题却没有达成这样的共识。J. B. 布瑞确实否认存在这样一个誕生日:“拜占庭帝国从来没有开始存在过;直到1453年,罗马帝国才归于灭亡。我们当然可以合理地使用‘拜占庭艺术’、‘拜占庭文化’这些说法,但是当我们谈及以君士坦丁之城为其中心的那个国家时,‘罗马帝国’是唯一合适的称谓。”^{〔2〕}

然而,布瑞的说法显然是指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某些历史学家并不接受这一观点。因为,汤因比教授就认为罗马帝国灭亡于公元6世纪末:正是这个帝国的“幽灵”后来占据着皇帝的宝座。新帝国诞生于7世纪,当利奥三世从

〔1〕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 98; 参见其在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6), pp. 49-52 中关于基督教史学的研究。

〔2〕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Macmillan, 1889), vol. I, V;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3), vol. IV, VII-IX.

亚洲来创立一个新王朝时它就形成了。^{〔1〕}新帝国是基督教东方应对穆罕默德继任者的严峻挑战的产物：当时被组织起来的这个国家只是一个“外壳”，它将成为抵抗穆斯林进攻的坚固屏障。这里不存在任何古代罗马帝国的延续性，而只是帝国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统治的重建，以此应对变化了的局势。

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并没有使用汤因比教授的理论思维。7世纪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失陷于阿拉伯人导致帝国采取了“应战”的措施，在亚洲建立起新的军事体制：确定将土地颁授给农民，条件是履行在帝国军队中服役的世袭义务。正是由于这个制度及其此后成功的推行，帝国的防务而后才得以维系，而且由于帝国遭受外敌连续几个世纪的人侵，奥斯特洛格夫斯基就认为^{〔2〕}，恰恰是这个新制度成为特色鲜明的拜占庭帝国开始的标志：而在此以前的所有历史都不过是个简单叙述的“前言”和“序幕”。^{〔3〕}

假如人们能充分理解我作为一个主编完全无意设法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本书的各位作者，也许我能够在这个前言中谈一下个人的意见。如果我们问及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还能不顾布瑞的意见继续使用“拜占庭帝国”这一名称？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始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件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君士坦丁堡皇帝恰恰是选择拜占庭这个希腊城市而没有选择其他地方来创建其新帝国的首都。近年来一直存在着千方百计贬低这一历史事件重要性的企图；据说这个新首都完全可以同样建立在小亚细亚，正像在我们时代土耳其帝国的首都被迁移到安卡拉一样。但是拜占庭人的小亚细亚却经常遭到敌人军队的蹂躏，其各个城市常被敌人占领。而君士坦丁堡则矗立在两大陆之间的水路通道上，由陆地城墙和朝向海洋的城墙所护卫，任凭诸般攻击，仍然屹立不动。即便有时帝国被压缩在这个城市要塞城墙工

〔1〕 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曾为前朝亚洲阿纳多利亚军区“将军”，717年兵变成为皇帝。——译者注

〔2〕 奥斯特洛格夫斯基(Georgije Ostrogorsky, 1902—1976年)，南斯拉夫著名拜占庭学家。——译者注

〔3〕 “717年形成了……拜占庭帝国”，见Henri Berr为Louis Bréhier, *Vie et Mort de Byzance* (Paris, Michel, 1947), XIII所写的前言。

事之内，而入侵者仍无计可施快快而退，这个都城仍然能保护文明的遗产免遭野蛮人的涂炭。这个城市是君士坦丁的重大战争纪念碑：希腊东方世界将永远不会忘记他战胜李锡尼^{〔1〕}的伟大功绩。君士坦丁通过修建这个新都建立起帝国的权力中心，在这里他能够聚集整个帝国的力量，并以基督教上帝的意志鼓舞着帝国。5世纪期间，新都更由于得到了圣母的长袍这个“新罗马”的护城符，而得到进一步的保护。我们应该适当地回顾一下这个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的所作所为。 xvii

那么，罗马帝国是否灭亡于6世纪末的某个年月，或者7世纪最初的10年？帝国的“幽灵”是否真的盘踞于皇帝的宝座？并非所有学者都愿意接受汤因比教授在他那篇关于历史巫术论文中表达的意见。某些学者认为如下的看法更合理：如果说罗马帝国灭亡了，那么其灭亡的年代应该确定在公元3世纪帝国权力终结和财政管理大动荡的时期。随着戴克里先的统治和君士坦丁反叛引发的骚乱，帝国得到重建，人们由此能够笃信无疑地认为一个新帝国得以创立。诚如维兰莫维兹-梅伦多夫(Milamowitz-Moellendorf)^{〔2〕}所言，这是地中海盆地历史上出现的重大转折点。那么，人们真的会否认罗马帝国没有灭亡而只是发生了内部变革，否认决定着这场变革本质特征的事实只是一个如同皇帝君士坦丁憧憬的帝国未来的梦想吗？他一直受到上帝的召唤去统治一个异教的帝国，并从其在西方的统治区域带来了罗马政府统治的传统制度。在米万桥战役中，他曾尝试着崇拜基督教的神，而这个基督徒的上帝真的使他战胜了马克森提^{〔3〕}：上帝的这一眷顾使他成为负有使命的皇帝，如同他自称的那样，成为“上帝的使者”。当他挺进到东方时，就进入了一片语言、文学和思想都希腊化的土地。这里不能产生任何将东方世界转变为拉丁世界的想法。这就是问题核心所在：一个建立在罗马法律和政府基础上的异教帝国，由一个受命在统一的基督教信仰基础上建立其帝国的基督教皇 xviii

〔1〕 李锡尼曾是晚期罗马帝国皇帝(308—324年在位)，在罗马内战中败于君士坦丁。——译者注

〔2〕 维兰莫维兹-梅伦多夫(1848—1931年)，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3〕 马克森提是罗马副皇帝马克西米安之子，其父去世后自立为帝，后于312年在米万桥战役中为君士坦丁攻灭。——译者注

帝进行统治,这个新帝国以基督教首都为中心,而这个都城又被根深蒂固的希腊文化传统所包围。那是些将被用来“构建大厦”的材料。这位本身就具有异教的罗马之至高权威的基督教皇帝,当然不可能使基督教成为国教,这连想都不用想,但是这个神奇般受到基督教上帝极度青睐的人却憧憬着未来将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他能够为未来所做的事情。在异教的罗马帝国自身内,他得以开始建立另一个基督教的帝国:总有一天,这个异教帝国的高大城墙将要崩塌,而基督教大厦将在其废墟上拔地而起。在基督教都城里,罗马的法律和统治传统将得到至高皇权赋予的权威,并得到皇权的支持,而皇权曾经是罗马国家宪政发展的基本因素;正在演变为基督教和东正教的这个国家本身将通过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得到支持,同时希腊思想、希腊艺术和建筑将保持希腊文化传统。君士坦丁正是在这个方面富有远见地预见到拜占庭帝国。正因为如此,任何人若想深入研究这个帝国都必须至少上溯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的时代。

构成君士坦丁难题的那些因素包括异教的希腊文化、罗马传统、基督教教会,这些都是经过长期较量斗争之后才逐渐显露出来的。这场斗争的编年史不只是囊括在拜占庭帝国史的前言或绪论中,它是这部历史的重要部分,因为在斗争的这一时期,确定了发展的方向,形成了发展的模式,进而决定了那种形成于转型过渡年代的文明的特征。不认真地考察这个帝国诞生时期的阵痛就无法充分理解此后的发展。

从一开始,帝国的统治者们就认识到他们肩负的责任,认识到他们必须保护其继承的文明的责任,认识到抗击外族野蛮人入侵或对付内部威胁的责任,来自内部的威胁主要指那些在帝国军中服役的蛮族士兵。这的确是一项需要极大勇气和坚定意志才能完成的任务。“假定历史上有超人的话,那一定可以在4世纪罗马皇帝中找到”。这一责任及其落实持续了几个世纪,而君士坦丁堡恰好是保护人类文明成就和遗产的圣地。防卫的形式可能有所变化,但是基本的任务却没有改变。当帝国于7世纪丧失了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其防卫体系不得不重新组建,而这次重组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同样的传统目标。至少在某些学者看来,正是这个如同晚期罗马帝国一样的目标构成了东罗马国

家历史的连贯性,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像7世纪的伊拉克略^[1]面临的任務如同6世纪的查士丁尼千方百计实现的目标一样,8世纪的利奥三世致力于完成同样的任务。正是这种历史的连贯性将罗马皇帝们先后有序地联结在一个单一的链条上,其初始点可以上溯到君士坦丁大帝和戴克里先。

汤因比教授认为专制主义的复兴和利奥三世时期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是致命的错误。然而,要想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其他变革方向则非易事。在西部,阿拉伯人摧毁了帝国在非洲的统治并入侵欧洲。假如利奥三世未能在帝国建立全面的中央集权并进而抵抗住阿拉伯人的进攻,那么他们对拜占庭帝国首都进行的极具威胁的进攻将会造成何种后果?帝国还能保存下来吗?这位皇帝确实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即便东罗马国家的历史连贯性受到质疑,但拜占庭文化的连贯性却难以受到挑战。在帝国内,曾经在亚历山大大帝后继者们建立的王国中兴起的希腊世界的文化继续存在,并孕育了东罗马帝国的成就。因为拜占庭人就是信仰基督教的亚历山大市民的后人。他们在艺术上继续保持希腊风格;他们继承了考究的文风传统,崇尚学问,欣赏伟大的希腊古典时代,托勒密王国的那些学者们代表了那个时代。这种倾向注定将激发对古典的模仿,毫无疑问,这也将导致变革。那些千方百计寻找东罗马帝国历史上存在连贯性的断裂证据,或者探求某些崭新事物逐渐形成的人,不得不承认拜占庭帝国文化并不存在类似的断裂:它一直存在到帝国自身灭亡之时。

然而,还是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分析拜占庭文明的基本性质。他们认为东罗马帝国是一个“东方的帝国”,并主张这个帝国确实逐渐变得更加东方化,直到8世纪时它“几乎就是东方”帝国了。这些说法被一再重复,好像在刻意反复规避寻求证据的必要性:显然证据从来也没出现过。希腊文明的确曾吸收了某些东方因素,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拜占庭帝国除了已经接受了希腊世界的因素之外还真的从东方进一步吸收了任何重要的因素吗?人们可能会提到在皇帝面前行跪拜大礼(匍匐跪拜礼),以残损肢体作为惩罚手段,可

[1] 伊拉克略是拜占庭帝国皇帝(610—641年在位)。——译者注

能还会提到某些冥思苦想的修道形式、极端的叙利亚修道生活、来自叙利亚韵律诗和韵律散文的希腊音乐和赞美诗以及配有弓箭的骑兵军团，还有什么其他的吗？的确，基督教本身最初就来自巴勒斯坦，但它很早就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克莱蒙特和奥利金^{〔1〕}这些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思想家作品的影响下，基督教才取得了其在希腊世界的立足点。我们能够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充分证明，完全拒绝接受毁坏圣像派的东方神学的拜占庭帝国，在推行其政策时，的确是在捍卫其自身基本的特征，我们认为综合构成拜占庭帝国复杂文明的诸种因素就包括罗马的法律和政府统治传统、希腊语言文学和哲学传统以及按照希腊风格重新塑造的基督教传统。

xxxi 在长期斗争中支撑拜占庭帝国的强大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简略概括地总结一下。笃信拜占庭帝国受到上帝眷顾，为上帝所庇护，得到上帝拣选的信念可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正是这一信念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东罗马帝国信守传统和极端保守的特征：假如你发现自己的国家受到上天眷顾的话，为何还要革新创造呢？皇帝可以被废黜，但帝国不能消除，否则无异于背教。独裁专制仍未受到挑战。由于得到上帝的眷顾，拜占庭君主和拜占庭国家都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对拜占庭人而言，十字军圣战早在他们呼唤西欧十字军之前很早就开始了，因为无论是对波斯人还是对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敌人都同样是不信上帝的人，而在东罗马军队头上升起的旗帜则是基督教的圣像——这些圣像有时或许不是由任何人类之手所绘。拜占庭帝国为了我主上帝而战，因而必得上帝超然之援助。像这样一种信仰产生的心理潜能，当代学者必须设身处地地加以理解，当然这绝非易事。

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上帝在人世的代理人之手，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源泉。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西欧出现了许多国家；但在东部，只保存着一个帝国，早期罗马的遗产，单一的法律则与之共存。在西部，人们的身家性命掌控在多种法律体系下——部落法、地方法、庄园法等，而中央集权国家的法律长期为获得认可而战。但在东部，法律一部接着一部被推行，罗马法都来

〔1〕 克莱蒙特(150—215年)为奥利金(185—254年)的老师，二者均为早期基督教教会作家。——译者注

自一个单一的源泉：皇帝，即便是教会主教会议的决定也要得到皇权的批准才能生效。君士坦丁确定的先例一直被其后继者所坚持。毁坏圣像运动期间，修道士们希望教会拥有更多自由而对皇权发起挑战，最终还是遭到失败。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则生活在皇宫的阴影里，在拜占庭帝国内，并不存在东方教皇生存的空间。^{xxxii}“生于紫色寝宫的”君士坦丁留下了一部《礼仪书》，这个事实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东罗马皇帝一生都是在连续不断的宫廷和宗教仪式中度过的印象，而这种活动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严格地按照传统礼仪用途穿戴各式礼服。这种印象是个误导，因为皇帝掌握着指挥拜占庭军队作战的权力，同时东罗马帝国的民众要求其君主无往不胜且亲临战阵。按照帝国的宪政理论，人们不承认王位世袭权利，然而皇统观念常常发挥重大影响。马其顿王朝时期，这种观念就使一个学者型的皇帝登上了皇位，而其副手则行使其军事职责，分担皇帝的部分责任。君主的义务是负责保障其臣民的教、俗福祉，这种极为沉重的职责塑造了拜占庭的皇帝观念，这一观念对皇权做出了限定，它能够将君主改变为另一个人：

他年轻时所学的课程都不能改变他。

但是当他父亲的身体很快就失去了活气儿时，

他内心激荡着的狂放不羁似乎也一起消亡了。

这说的是瓦西里二世^[1]，“他痛下决心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转而变得严肃认真”。^[2]把拜占庭皇帝描绘为皇宫里的玩偶显然是错误的，皇帝不仅是所有军政权力的源泉，是唯一的立法者和最高法官，而且如同庇西底亚的乔治^[3]所说，在战争中皇帝控制着执行上帝意旨的权力。

东罗马国家需要金钱，大量的金钱，因为任何拜占庭君主都不能“靠他自己为生”。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行政体制瓦解的大危机期间，严重的通货膨胀

[1] 瓦西里二世，拜占庭帝国皇帝，976—1025年在位。——译者注

[2] Psellus, *Chronographia*, vol. I, ch. 4.

[3] 庇西底亚的乔治是小亚细亚基督教中心城市庇西底亚的主教。——译者注

xxiii 使所有物价飞涨，帝国经济凋敝，倒退到以物易物的贸易体制。但是，4 世纪的改革使货币经济和税收制度得到恢复，因而使帝国政府统治的现实需求得到满足。当处于野蛮民族君主统治下的西欧难以维系罗马帝国复杂的财政制度时，东罗马国家的需求则通过恢复财政制度得到了满足，这种制度使帝国能够向其将士支付现金军饷；而如果军队战事失利，君士坦丁堡的外交活动就可以依赖拜占庭金币的强大影响力。正是这些征收自其臣民的税收贡赋使得拜占庭帝国得以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精于战争艺术的常备军队，这门艺术常用常新，因为新的入侵之敌总是促使他们修改军事手册。这一小股训练极佳的军队无论花费多么昂贵都必须维持：因为不存在任何一支同样的武装力量可以及时应付紧急情况。帝国的战争并非骑士枪术比赛，而是性命攸关的重大事务。因此，必须阻止危险发生，设伏袭击、佯攻虚击、使宝贵的生命能得到救助的长途远征都是拜占庭军事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据我们所知，东罗马军队的数量优势难以置信地弱小。正如迪尔^{〔1〕}曾指出的，贝利撒留^{〔2〕}用于收复非洲征服汪达尔人的军队只有 15000 人；10 世纪用于收复克里特岛庞大远征军的登陆部队最多不过 9000—15000 人。10 世纪拜占庭军队力量的总人数至多不过 14 万。

当拜占庭帝国缺乏直接海上威胁时，它总是会忽视舰队建设。在公元初的三个世纪期间，地中海一度是罗马的内海。唯一一个在罗马帝国土地上形成的蛮族王国是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它一度控制地中海，在其舰队面前，帝国显得无能为力，致使帝国东、西两部分的海上联系因此中断。皇帝利奥甚至担心汪达尔人会进攻亚历山大城：他曾向斯提利特(Stylite)派圣徒达尼埃尔(Daniel)^{〔3〕}咨询，后者断然回答他，其担心毫无根据，事实上，这个圣徒颇有信心的看法是正确的。查士丁尼在其海洋政策中做出了极大努力，对北非发动了进攻，但是在其灭亡了汪达尔王国之后，直到 7 世纪阿拉伯人海上势力兴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任何其他的海上行动。君士坦斯二世重新组建帝国

xxiv

〔1〕 夏尔·迪尔，现代法国著名拜占庭学家。——译者注

〔2〕 贝利撒留(505—565 年)，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著名军事将领。——译者注

〔3〕 达尼埃尔(Daniel Stylite)，4 世纪小亚细亚修士，被其追随者视为圣人，常被皇帝咨询问事。——译者注

舰队,并于662年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西西里,他的目的,正如布瑞所说,就是以西部海军基地确保北非和西西里免受阿拉伯人进攻,阻止他们包围帝国:“如果萨拉森人在这些岛屿上取得立足点,那么希腊就将暴露于敌人,这个亚得里亚海大门就将洞开,达尔马提亚和(拉文纳)总督区就处于他们的威胁下”(布瑞语)。然而,君士坦斯去世了,其继位者只在东地中海保持帝国海军,萨拉森人^[1]得以将罗马人驱逐出迦太基。帝国从此丧失了北非。

当哈里发势力从叙利亚转移到美索不达米亚以后,君士坦丁堡解除了所有来自海上的威胁,这时埃及和叙利亚的海军就衰落了,结果拜占庭海军最终还是被忽视了。在马其顿王朝时期,东罗马帝国舰队在帝国的一系列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后来帝国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即过分依赖威尼斯海军,从而丧失了其对海洋的控制。拜占庭国家的海军政策确实不如早几个世纪罗马共和国时期那样能对外部出现的挑战做出反应。

军队和舰队能够防御帝国的外部威胁,但是维系其内部统治的则是帝国行政体系。这个体系花费极为昂贵,其体制几乎沿袭旧制,伴随着腐败,但总的看来,它却似乎是也始终是高效率的,它以自身的惯性推动着整个管理机构运转。在懦弱无能的皇帝统治时期,它仍然能够发挥管理作用,锐意改革的皇帝制定的法律毫无疑问能得到推行,而后就逐渐松弛废弃。我们缺乏足够多的文献证据来描述这一帝国行政体制的历史,历史学家们只能含糊其辞,他们只是在某些引发公众不满的重大丑闻出现时才提到它。其活力也是一个解释帝国之所以能长期存在的原因。

东正教教会的管理系统对东罗马帝国来说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从任何角度看都是维系拜占庭国家的因素。

正如威廉·兰赛爵士^[2]在1908年的一次纪念演讲中所说:“拉丁教会从来没有将自己看做帝国的一部分。即便它屈驾降低自己与帝国同一水平的

xxv

[1] 萨拉森人是古代中世纪欧洲文献中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后来泛指穆斯林。——译者注

[2] 威廉·兰赛爵士(1852—1916年),苏格兰化学家,19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译者注